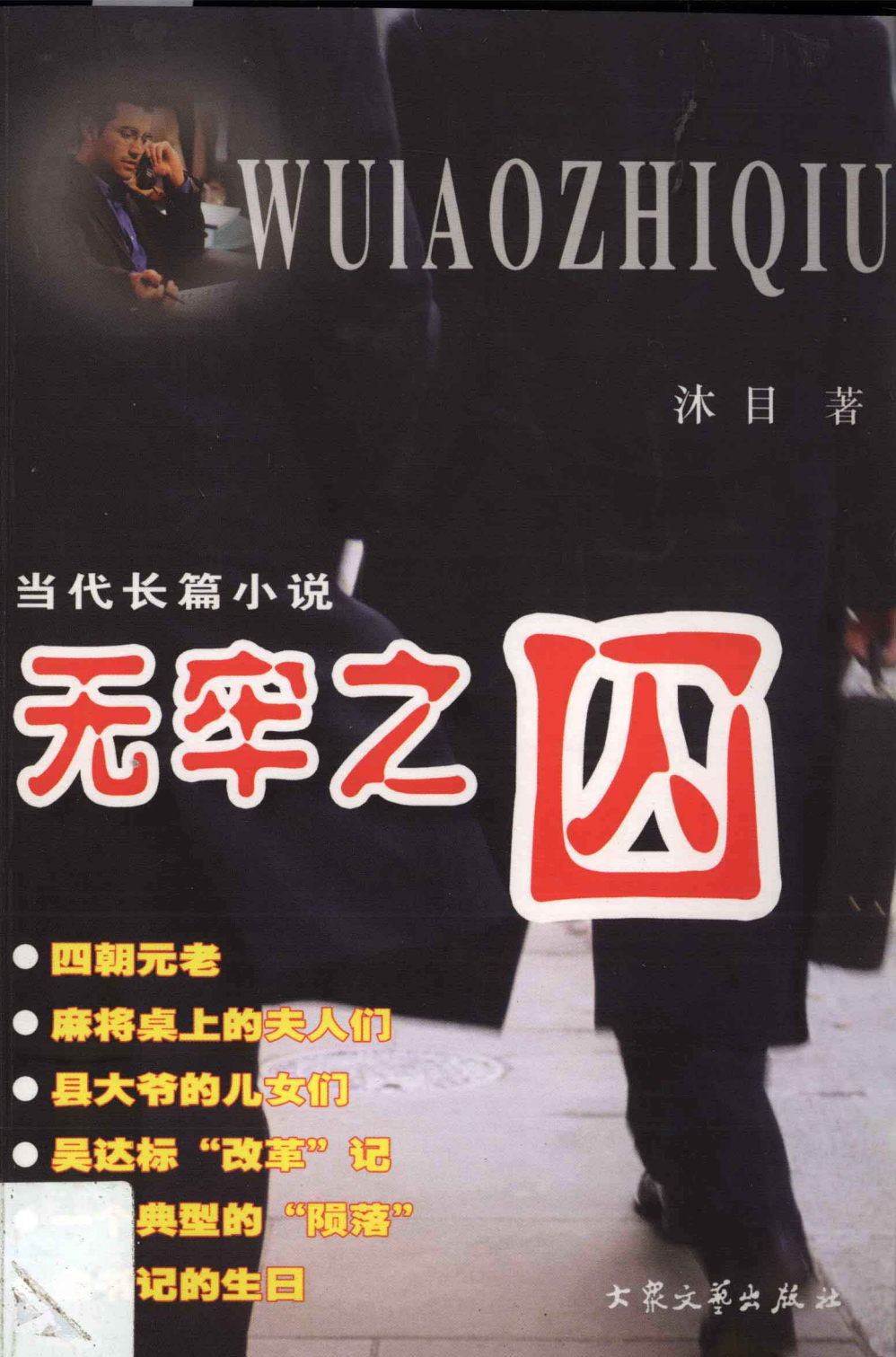




WULIAOZHIGUO

沐目著

当代长篇小说

无牵之囚

- 四朝元老
- 麻将桌上的夫人们
- 县大爷的儿女们
- 吴达标“改革”记
- 一个典型的“陨落”
- 吴达标记的生日

大众文艺出版社



WUJIAOZHIGU

沐目 著

当代长篇小说

无牵之囚

- 四朝元老
- 麻将桌上的夫人们
- 县大爷的儿女们
- 吴达标“改革”记
- 一个典型的“陨落”
- 金书记的生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牢之囚/沐目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10(2005.9重印)

ISBN 7-80171-522-5

I. 无…

II. 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901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420 千字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71-522-5/I·350

定价:48.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目 录

一、四朝元老	(1)
二、麻将桌上的夫人们	(16)
三、县大爷的儿女们	(34)
四、吴达标“改革”记	(63)
五、一个典型的“陨落”	(119)
六、金书记的生日	(148)
七、姜新辉进了检察院	(212)
八、夜静人不静	(262)
九、文人有行亦无行	(325)
十、保密箱里的秘密	(369)
十一、旅月生的“民为本”和“农民意识”	(409)
十二、刁思慎的官历记	(432)

一、四朝元老

1

康侃曾经在河县当过政府部门长官。县长称之为“七品芝麻官”，他说他是“无级豆芽”。用他自己的说文解字法说，别看“芝麻官”三字，并非贬其小，其涵义深刻。乡里有句俗话，叫作“芝麻开花节节高”。县长叫做“芝麻官”，图的就是这个“节节高”的“高”字。中国的官体制，从古至今，进了县级，才可称为“老爷”，或者“大人”，才上档次，才有品位，才是被中央排定了级别的朝廷命官，才能享受国家有规定的特别待遇。特别是一方“诸侯”的县长、书记，风婆，雨婆，俱属隶属，有权有力，再向上开一节花，就是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了。而县级以下的干部，过去称之为“帮办”，或者叫“帮闲”，或者叫“箴片”，现在称之为办事员、干事，更高一级的叫科员，或者主任科员，有的带“长”字的，也是干事，在“领导干部”面前加个“基层”，叫“基层领导干部”。都是席上的豆芽菜，可作黄焖鱼汤料，可调狗肉火锅味，可拌韭菜嫩火小炒，也可作“三鲜汤”的辅料……总之，是无品次的开口味的料菜。并且豆芽菜生长特别，它不像芝麻，长在杆杆上面，铃铃铛铛，迎风招展。豆芽菜是不能出土面的，永远不能长成青苗苗，长成青苗苗，就没市场价值了。豆芽在生长过程中，它也不像芝麻，有阳光普照，有绿叶扶持，它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底气，遇水而挣扎的生命力底气。并且，豆芽永远只能进市场，作菜卖，不能结果。

其实，康侃在河县县长、书记的一方诸侯地，也不是一个小官，是已攀缘到芝麻杆边上的一个局的正科级副局长了。虽然挂了一个“副”字，实际是“一把手”。因为在他任职时期，该局局长一直由县长或副县长兼任，其局长职能实际由他代而行之。康侃还任过县委常委秘书，

是一个受县委书记、县长器重的“捉笔匠”。在河县老百姓眼中，康侃是一个当过“师爷”、执掌过大印、本事能通天的“大官”。

然而，康侃不善攀龙附凤，附风作雅。觉得自己是调口味的豆芽菜，不能体现活人味——也可能是如此，所以他的“代”字一直取不掉，于是他毅然下了“海”，干起了长途贩运、“买单卖单”的服装和服装材料生意。最近又做起了电器和电子产品生意，触角伸到了国外。

康侃的生意做得还算顺利。但市场是两刃刀，不刮这边刮那边，虽赚了点钱，但也活的不轻松。十几年的“走江湖”——他把做生意称作走江湖，他又觉得还是当官轻松，活得潇洒。做生意的赚钱，做官的也赚钱。做官的赚钱比做生意的赚得容易、便捷，还能与政绩突出相连。他甚至后悔当年没有认真珍惜官场足地了。为什么不能为“三斗米”而折折腰呢？人是要有点市侩经的啊！

康侃从广州回来，顺便到边州市委组织部探望了老同学钟圣。从钟圣那里，他得知李永在河县民望极高。这次戚县长调走，边州市委组织部到河县考察县级领导班子，民意测验和民主推荐县长——实际上只有正科级以上科局和乡镇主要领导参与，李永的得分最高，比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章占玉还高。钟圣说，根据民意测验与考察，民主推荐，李永这次当不了县长，常务副县长是靠得住的了。

康侃听说后，非常高兴。说：“钟圣，你与李永可称得上是相互最了解的老同事了。你当年在河县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他也是副部长，你可要助他一把啊！”

钟圣说：“李永是个好人，有能力，有才气，很务实，会想，会讲，会写，也会干。你不知道吧？去年，河县发生水灾，水势凶猛，银沙河决堤，一车一车的石头倒入缺口，马上就被汹涌的大水冲走。缺口越来越大，急得当时分工负责银沙河防汛指挥的金贤没有办法，直叫‘完了！完了！’急向县防汛指挥部呼救。正赶上早有预料的县防汛指挥部副主任李永前来督查，见此状况，当机立断，叫装运石头的两个翻斗车司机把车连同石头一起开入缺口。一下就把汹涌的大水堵住了。保护了银河镇三万多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金贤是河县的县委副书记……”

“我知道。”康侃说，“金贤当时很有意见，认为李永没有请示他，

给了他难堪。说,‘是否请示一下刁书记和戚县长?’李永没有理他,说,‘分秒必争,你请示吧!’金贤还没打通电话,车已开到了水里。李永马上跳到水里,指挥两边的人向他手指的方向丢石头和沙袋。后来,银河镇人民送了李永一面锦旗:当机立断降水魔,一心为民好领导。李永没受。说功劳应归于党和人民!我是防汛指挥部副主任,如果没有带领人民搞好防汛,等于失职和犯罪。弄得站在边上的金贤相当尴尬。”

钟圣说:“这事反映到了边州市委。有的领导说,关键时候最考验干部,也最能了解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这样的干部应当提拔。我们组织部也这么认为。”

“可是,边州市常委会议没有通过,是吗?”康侃说。

钟圣叹了口气,说:“李永就是事业心太强了,太实在了。”

2

康侃驾着寄放在边州市委后面坪里的桑塔纳车拐弯到了一个朋友家后,直往河县开。途经羊角桥至高等级公路的交界处,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堵车了。似乎无人维护秩序,车辆错位占道,紧紧密密,排了一长列,望不到头。康侃没有下车,心里说:“真倒霉。摆停这样乱,看样子得有一些时间。”

康侃把座位往后放倒,躺下睡觉。

如果是十年前,康侃还在官位上,这个爱管闲事的康侃,会下车问个究竟,插手管管的。

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县里还没有交警大队,叫车辆监理所的时候,他在监理所干过。疏理交通,他是里手。现在,身上还有“安全员”证哩。原来是职责使然,后来当了官,虽然不是管交通的,但是在官位上。“官”字与“管”字虽然有点区别,但位子还是在雷池里。并且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还有维护交通安全的潜意识使命感,他会早下车处理了。那年,他到上海出差,火车站秩序很乱,买票不排队,你拥我挤,闹嚷嚷的。“钳工”大显身手。一女同胞钱包被扒,买票没有了钱,哭了

起来。康侃见状,向大厅扫视了一下,立即向厕所跑去。见两个青年正在分钱,他大吼一声。走上前,冷不防一个耳光向那大个青年脸上搨了去。说:“你们欢喜人家悲,得这样的昧心钱,要得吗?赶快把钱送还人家!别人要死不活地在哭哩。”那大个青年见面前站的是两眼怒视、目光严厉、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不知此人到底是谁。慌了神,忙向康侃口袋里塞钱说:“老……老……这是您的,我们正准备向你们送去哩”。康侃愣了一下。但立即明白了——这两个扒手把他当成新来车站的警察了。康侃说:“把钱都交出来。”两个扒手相互对视了一下,乖乖地把钱交给了康侃。康侃把钱攥在手里,指着大个子说:“你衣袋里还有。”大个子胆怯地望着康侃,慢吞吞地、不情愿地伸手向衣袋里掏,掏出了一块女式手表和两百元钞票,说:“这……”康侃说:“都拿过来。”康侃接过钱和手表,说:“滚!赶快离开车站!不走,老子就揍死你!”那两个扒手丧气地溜出车站门外。康侃来到被扒去钱的在哭的女同胞面前,说:“这手表是你的吗?”女同胞接过手表一看,说:“是的。”康侃又问清楚女同胞丢了多少钱,把从扒手那里要回的钱交给她。女同胞接过钱一数,分文不少。向康侃鞠躬说:“谢谢!”还塞给康侃五十元钱。康侃没有要,说:“以后要小心点。”他朝卖票的窗口前一站。旅客以为他要买票,忙礼貌地向后退,让出位子。康侃将两手合起,做成一个喇叭筒,对着嘴巴向窗前乱嚷嚷买票的旅客喊道:“旅客们,同志们,不要拥挤,请自觉排好队,依次买票。大家一拥挤,扒手就有空子可钻了。我们要提高警惕,相互关照,自觉维护秩序。”旅客们听他这么一喊,立即有秩序地排起了队。待他去后面排队买票的时候,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向他递过一张去南京的车票,说:“同志,你不要排队了,我替你买好了。”康侃接过车票,说:“同志,你怎么知道我去南京?”青年说:“你进车站的时候不是在指示牌前看去南京的车次吗?我也是去南京。其实,小偷扒那个女同志钱的时候,我看见,但我不敢喊。你真勇敢,目光锐厉,有侠义精神,我佩服你!”康侃说:“其实,我没有看见他们扒钱,我只看见两个青年围着那个女同志拥挤,又没买票,一会就走了。我怀疑他们是扒手,一直盯着他们向厕所方向走去。我上前问那个女同志丢东西没有,但女同志瞥了我一眼,挪了一下背

包,没有反应,继续向窗口拥挤。”后来康侃与那个学生结成了莫逆之交,还在生意上得到过那个学生的帮助哩。原来,旅客们都还真的以为康侃是便衣警察或是个有来头的体察民情的大官哩。

康侃闭起双眼,像在睡觉,但他没有睡着。他不是那颗爱管“闲事”的心担心前面疏理交通,或是担心睡过了头,车子突然要走,自己拉了队,影响别人前进。而是李永这次能否当上县长的事,在他脑子里萦绕。

3

康侃与李永是老同行,也是老朋友。

李永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水利电力学院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河县后,首先在基层站工作,后来调水利电力局任办公室主任。康侃当时任县委常委秘书,与李永常有工作联系,并成为好朋友。

河县地势东高西低。东属山区,西属平原,海拔相差一千四百多米,雨水充沛,河流纵横。主要河流有金沙河、银沙河、乌龙河。大小溪、河流三百多条,五公里以上的达二百多条,故名河县。年降雨量一千六百至二千毫米,有时十天的最大降雨量达四百八十毫米,超过一百毫米的暴雨天数每年有一至二天。但降雨不均匀,平原少,山区多,故常有水灾发生。全县有大中小型水库二百多座,大小山塘三万六千多口,各类水坝近万处。是边州地区重点防汛县。

李永调水利电力局办公室不久,根据全县水利建设和历年的降雨与抗旱情况,写了一篇“蓄与放 堵与疏 未雨绸缪”的辩证处理防汛与抗旱的专题调查报告。并根据历史资料的统计和降雨量的分布情况,总结了降雨和水情变化的规律,绘出了降雨路线和雨水分布示意图。康侃看后,立即翻印送交了县委各常委。引起了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祖旭升的重视,立马把李永调到属政府直接领导的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李永主持,制订了全县按防汛抗旱整修水利工程的规划。由于规划客观、合理、实在,各级政府投入力度大,实施得力,各水利工程调控能力强,尽管八十年代曾发生过多次较大的水灾,但河县损失不大。

祖旭升任河县委书记，把李永调到淮圳乡任书记。李永根据淮圳乡离城关近、交通发达的地理优势，制订了淮圳“农重经作，工重科技，商活流通，向现代化迈进”的淮圳五年发展规划。他大胆启用有文化的中青年干部，并到农业大学、河县和边州市有关科局请教授、专家为干部和群众讲授科技课，实行面对面的直观教学。同时，结合实际，组织干部和农民去经济发达的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和考察，开拓视野，解放思想，启迪思维。并要求凡出外考察者回来必须上一个项目。三年后，淮圳乡冒出了一百八十多个专业户，三个基建队，产供销相结合、联动效应很强的八个经营服务公司和农产品加工厂，二十几个长途贩运户，成了全河县的经济发达乡。在介绍经验时，李永说干部的工作职能是为民谋事，组织、引导、示范和服务，深得祖旭升的赞赏。不久，李永调组织部任副部长。一年后，任部长、县委常委。

由于县长、书记的更换，李永的职务也不断更换。先后任过宣传部长、纪委书记、办公室主任。无论在哪个岗位，李永都干得很出色，在河县有“干才”之称。

李永不仅工作出色，廉洁奉公在河县也很有名。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时，他带领河县部分乡镇企业家和银行、税务、工商等有关部门领导去广州、深圳、澳门、香港等地参观、考察时，同伴们大包小包买了许多东西，他想买一把德国产的剃须刀，三进三出商店，最后还是没有买。有一企业老板叫和润泉，看李永没买一件东西，以为李永吝啬，说：“世上钱世上用，留着干什么？连一把剃须刀也舍不得买，我买把送给你？”李永制止说：“国产的便宜，这里买一把的钱，在国内要买好几把哩。”和润泉说：“又不要你花钱！”李永说：“不花钱的东西我更不能要。”和润泉不相信李永真的那么廉洁，就多了一个心眼，处处留意李永到底买不买东西，也留意别人是否买东西送他。一路上，他没见李永买任何东西，也没见李永跟任何人逛商店。和润泉还是不相信，回旅店后，把搞企业的同伴叫来，说：“今天请李主任请客，看李主任给他夫人买了些什么？”也不等李永同意，把李永的旅行袋翻了个底朝天。除李永的换洗衣服外，什么也没有。他还是不甘心，要李永拿钱包出来。结果，钱包里没有一分钱港币，只有二百元人民币。和润泉心服了，但也

很难过,说:“李主任,我们不是第一次跟领导出差,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的领导,带两百元人民币出来,还带两百元人民币回去——跟你来回旅游,白跑一趟。何况是出了国门呢(那时香港澳门还未回归)?没有哪个领导不买名牌、特产和金银首饰,有的妻子还打长途电话点名要呢。他们花起钱来比我们还大方,好像是捡来的。你看那些银行、税务领导,他们哪个不是花了几万元?”和润泉把剩下的港币拿了出来,其他的企业老板也都跟着拿了出来,说:“李主任,钱不多,你拿去给小孩买点吃的东西,给夫人买件衣服吧。”李永坚决不要,说:“这两百元钱,我就是留着给小孩买吃的东西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李永的事迹在河县传了开来,特别是去年银沙河防洪开车堵水的事迹更是轰动了全县,人们无不竖起拇指称好。但是,功高震主,才高也惊主。不免不引起一些领导人的嫉妒,说他固执、高傲、不尊重领导、不善于理顺上下关系。

康侃虽然没有直接与李永共过事,但他们却是猩猩惜猩猩,才子爱佳人,心往,神往,相互佩服。康侃虽然“下海”,离开了政界,但对李永的仕途还是很关心。

李永任县委常委、兼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时,只三十来岁。但是,原地踏步,常委位置一干就是十年,历经了四位书记,三位县长。每届书记、县长都对他的工作与能力评价很高,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边州市每年来考核县领导班子,他都被评为优秀。可就是提拔不起来。他的同僚,有的比他后进机关的,有的当了县长,有的上调了,当了他的上司。而他呢,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立着不动。论才干,论工作实绩,论德行,论学识水平,李永哪一样都不比别人差,年龄也正当时,文凭也有,可是……许多人都为他打抱不平,康侃也为他抱过不平。

这次是不是又有人在为他打抱不平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只怕又会泡汤了!康侃想。

康侃正想着,后面的车鸣起了喇叭,前面的车开始挪动了。康侃向

后伸手,把座位扶正——他忍不住笑了,“扶正还要向后伸手啊!”把车向前挪动了几步,又停下了。

康侃放下车窗玻璃,把头伸出窗外看,后面的车望不到头,还在慢慢向前一步一步移动。前面车没动,但人流动了。一对青年男女向他车前走来,边走边说:“还是李常委有水平,如果都像花县长,那我们都要坐牢了。”

康侃听出,李常委是说李永,花县长是说花丰。

康侃下车,拦住两人,说:“同志,前面出了什么事?”

那两个青年男女向车里看了看,里面没坐人,又看车上牌照,牌照不是本县的。见康侃身着休闲服,个子高大,满脸笑容,和蔼可亲的样子,以为康侃是外地开车的师傅。男青年说:“师傅不是本地人吧?”

康侃笑笑,点头道:“嗯。”

男青年说:“我们这里出了大事啦!来了个台湾商人,实际代理商是本地人,通过花县长与乡上签订了个协议:只要你来办厂,一切好商量,土地无偿赠送,‘一国两制’,红灯保护。乡上也没通过村上和各承包山主,在地图上把红线一圈,将界临三个村的羊角桥六百亩土地无偿赠送给那位台商,由代理商负责经营、开发和管理。并通过国土部门,实地踏看钉桩后,正式签订了协议,盖上了各级政府大印,还经过司法部门进行了公证。当时,群众有意见,各村干部也有看法,但后来花县长和乡政府领导到各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做思想工作,说这是羊角桥乡招商引资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县里面的一个重点保护项目。花县长还算了一笔帐,描绘说:建厂后,可以安置多少多少个农民就业,每个农民一年挣一万二千元,羊角桥乡农民一年就增收好几百万元;有了厂,农民还可以搞第三产业,带动其他服务行业,这又是好几百甚至几千万元;县里、乡里还能增加多少多少财政税收。还说将来要引进更多的外资项目,把羊角桥办成边州市级的或者省级的工业园。各村都像华西村一样,农民变工人。一家人如果有二三人 在厂做事,每年收入就是好几万元,靠你家的几亩荒山、几亩薄田、薄土能赚这么多钱吗?农民一听,心里都算起了账:是呀,有道理,现在受点损失,将来有大收入,城里工人失业,我们农民变工人,且永远有事做,有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呢！大家认为花县长和乡政府为羊角桥乡引进了一只‘金凤凰’，为农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只要能安排农民进厂做事，农民要求花县长为羊角桥乡多引进一些外资开发项目，一样是无偿赠送土地。但是也有些人怀疑，认为那位台湾代理商也曾是河县‘能人榜’上有名的‘能人’，专要银行的钱，后来破了产，还不起银行的贷款，一直流蹿在外，现在又回来当台湾代理商，靠得住吗？但是花县长说，我们是与台商打交道，是经过了银行的资讯审查的。代理商只是为台商办具体事，是办事员，签字的法人代表还是台商老板，而且台商老板投了资的资产还在这里呀，还有什么不放心呢？人民是相信领导、相信党和政府的，何况是花县长亲自主持的呢。可是，圈地两年多，一直未动工，那位代理商也杳无音讯。去年，桥下组几户农民在原来是自己的山上挖黄泥烧红砖，那位代理商突然从天上落了下来，要索赔。后来，通过调解，还是被搞去了好几百元。今年，他带了图纸回来，说要正式动工办厂，还带来了一个由他情妇的父亲任包工头的施工队在钉桩的地方挖壕砌围墙。当地村民有意见，向乡政府报告：原来花县长说过，无偿征收了土地，将来农民可以进厂做事。现在开工搞基建了，当地农民一个也不用，当小工也不安排，全用的是他情妇家的人。乡政府去协调了几次，都未能达成协议。后来，那位代理商同意用一部分当地农民做小工，但是，同工不同酬，工资很低。假洋鬼子真唱，侮辱我们农民是刁民，说：‘我台湾老板来你大陆投资办厂，图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能来你们羊角桥，是你们的福，否则你们连这点钱也赚不到！一个打工仔，一副穷骨头，也想吃天鹅肉？真是一帮刁民！’农民气不过，打了那个假洋鬼子——代理商，也打了那个包工头，并联名向乡政府打报告，要求收回土地，撵走施工队，不准施工。这下可闯大祸了，假洋鬼子假台商老板的名义，告到县委、县政府，告到花县长那里。那个假洋鬼子还小戏大唱，小病大养，和包工头住进了医院。花县长带了公检法，来这里抓人。龙无头，抓谁呢？被群众围住了。后来李常委带县委办公室的一个秘书来了，了解情况后，立即召开村干部、村民组长和农民代表座谈会议，指出打人是违法的，安排劳动力做事与报酬问题，应当通过村管委或者乡政府劳务部门依法与对方签订劳务协议。并保证不抓人，也不搞秋后算账。关

于无偿出让的土地与劳务问题，由县委或县政府直接与台商老板联系协商解决。宣布公检法不抓人。群众也撤围了。”那女青年说：“听说李常委要当正县长了，到底是正水平。”

“啊——”康侃又点了下头，心里说：“真是冤家路窄。”

5

康侃回到家里，在人事局当干部的妻子贺英立即告诉他：“戚县长调走了。”

康侃说：“现在谁主持政府工作？”

贺英说：“刁书记两权独揽，又当书记，又代县长。”

康侃说：“不是还有个常务副县长吗？”

贺英说：“那个章占玉呀，刁书记怎么会让他当呢？他与戚县长都是原来旅县长培养的，解书记提拔的，刁书记不会让他进入自己圈子内的。如果让章占玉升正，那刁书记就不会兼代了啦。”

康侃说：“边州市委组织部不是已经来搞民意测验与民主推荐了吗？”

贺英说：“中国的组织路线是党管干部。谁最能代表党？当然是书记啦。河县是边州市抓‘一把手工程’建设的典范，一把手说了算。刁书记又是边州市委常委，兼河县县委书记，民意测验管个屁用，最多作个参考，最终刁书记说了算，他说当得就当得，当不得就当不得。你当局长的时候，提个股长，还不是你说了算，你不点头谁敢提？”

康侃故意说：“那是上级任命下级呀。”

贺英说：“刁书记是边州市委常委，他在边州市委常委会有否决权呀！他还是坐地虎——河县一把手县委书记呢，‘我对河县的干部情况最熟悉，最有发言权！’边州市委哪个领导不听他的？刁书记任副书记的时候，能把旅县长拱走降职任边州市财办副主任，自己取而代之，难道现在不能左右河县县长人选？如果不能左右，那他就真是窝囊费了。你说他是窝囊费吗？”

康侃说：“当然不是。那到底谁来当县长呢？”

贺英说：“李永也是被推荐者之一，听说边州市委还对他进行了专门考察，不过……”

贺英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

但康侃想听听这个在人事局当干部的妻子到底还有“不过……”什么？

康侃知道，妻子是一个灵通人士，做了几十年的组织人事工作，很有经验。特别是对官场人员变动，往往都在她的意料中，人们都说她脑子里有一个“官脉图”，是“业余组织部长”。

康侃急切地问：“不过什么？”

贺英卖关子说：“你是做生意的，李永与你又是朋友，说了别又增加你的烦恼。”

康侃说：“难道李永当不了县长？我听钟圣说，这次边州市委在河县民意测验，李永得分率最高，不当县长也会安排个常务副县长干干。钟圣是边州市委组织部的领导，难道消息不准？”

贺英说：“改革这么多年了，你的脑子怎么还是计划经济，没有一点市场意识。难怪你当不了官，只会赚钱，不会赚官。”

康侃哈哈地笑着说：“我们家有一个当官的就可以了嘛。”

贺英说：“我是什么官？我是按领导意图办事的办事员。我如果想当官，个把局长早就当了哩。女人嘛，只是为了混碗饭吃，不成为男人的累赘和附庸，不受丈夫的经济制约，有独立自主权。”

康侃说：“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办事的干部在老百姓眼中可有大权呀，人财物，管人的干部最吃香。”

贺英说：“你这把贫嘴，只会在你老婆面前拍马屁。”

康侃说：“你不是说，妻贤夫祸少，男人能讨老婆欢心是个福嘛。”

贺英说：“钟圣还与你说了些什么？”

康侃说：“钟圣说，李永事业心太强了，人太实在了。要李永读读《韩非子》，研究一下‘买椟还珠’和‘秦伯嫁女’的故事。”

贺英说：“到底是当组织部长的领导，知道官道，不像你们这般蠢才。”

康侃说：“你心中有本‘官脉图’，你也是民间封的‘业余组织部长’

呀,你说说,李永会提一下吗?”

贺英说:“依我看,是很难的。”

康侃说:“为什么?”

贺英说:“官场上有这样的箴言: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前二句讲的都是以自己为半径画圈子,后面两句重点讲的是疑人不用。李永是四朝元老了,经过了四任书记。第一任书记信任他,提拔他进了县委常委,并任组织部长。第二任书记就把他从组织部长的位置挪到宣传部任部长,不让他管干部了,因为第二任书记要安排自己的人看自己的‘门’呀,你是前任书记的组织部长,是否会听我的?疑人不用。第三任书记是从边州市委机关调来的较传统化的实在人,刚刚熟悉情况,还没来得及大动干部,就被在政府干过多年,任过副县长、县长,熟悉官场‘经符’,上有背景,下有圈子的刁书记拱走了。刁书记是一个官场强驭手,也是一个狠手,腑藏很深,手段很阴,他一上台就大换干部,任书记还不到三年,他以干部‘四化’为名,像流水一样,科局级干部、乡镇领导干部调整了五轮,有的干部年对年,调动三次。干什么?一手硬,一手软,不听我的就挪开你。无非就是恩宠干部,恩威并施,换上听话的,能看住自己‘门’的人。原政府办的、他的家乡东山人,大部分安排到了重要岗位。科局级领导干部,东山人占了一大半,把过去北山人一统天下的局面翻转过来了。随身秘书汪洪,一个说大话、耍牌子的草包,放到富裕的金圣镇任书记,不熟悉干部情况,也想学习刁书记,以我画圈子,乱动干部,乱调岗位,结果,把那里的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群众怨声载道,干部离心离德。刁书记只好把他调到乡企局任书记,不到半年,又调他到财政局任常务副局长,明降暗升,准备将来当局长,为他看住财门。刁书记靠背景进边州市委常委后,县委常委班子、政府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几次大的交流,老的、难领导的、与前几任书记关系密切的人进人大、政协,或者当顾问。提拔年轻的,自己信得过的亲信,甚至是亲戚,原任过他秘书的两个人最近都进了县委常委。”

康侃说:“这我知道。我说的是李永。”

贺英说:“你别急嘛,听我慢慢说嘛。李永年轻,又有学历,人也实

在，一心扑在工作上，在他身上难找个‘不’字。宣传部是县委的喉舌，也是领导的喇叭，刁书记觉得李永实在，难于驾驭，不宜当宣传部长，安排了他的亲信，把李永调到纪委。又觉得李永耿直无情，原则性强，不听使唤，把他调到县委办公室任主任。但刁书记却把他这个主任架空了，从政府办提拔两个秘书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永忠正、实在、廉洁、事业心强，这四点立人的根本。但水至清无鱼，缺少‘朋友’，缺少‘心眼’，会被‘有心人’提防。刁书记上任不久，李永写了一篇《领导者的胸怀》的文章，发表在省《共产党人》杂志上，还获了奖。李永虽然谈的是自己的体会，但讲究个人权威的刁书记，不会不对李永产生疑忌，特别是讲到对前任功过的评价和干部安排问题，刁书记还以为是指他呢。刁书记没把李永下调就不错了。去年人大会选副县长，不是也有代表联名提了李永的名嘛，但是，刁书记不同意，说李永要抓党务。看起来是信任他，实际上是抑制他。”

康侃沉默了，觉得如果在河县内产生，从工作出发，从大局出发，任人惟贤，非李永莫属。

康侃想了想，又觉得贺英的分析有道理，符合刁思慎的个性和他的用人原则。他忙说：“那你说谁会当县长呢？”

贺英说：“如果在河县内产生，那是花丰。我想，以刁书记的个性，是绝不会在他任期内，调进他不熟悉的河县以外的人来当县长的，他一定会在边州市委常委会上力举花丰。”

康侃惊讶，说：“花丰能当县长？”

贺英说：“花丰是你的朋友，他当县长，你有意见呀？他妻子与我们还是亲戚关系呢。花丰当了县长，你做生意，对你只有好处呀。”

康侃说：“花丰的性格我知道，他是个崇富、沽名钓誉、爱虚荣的人，走上层路线，群众基础很差。他任工业局局长的时候，选县党代表，县里点名在工业局机关选他，还增加了代表名额，两次都没选上。他有什么群众基础，什么威信？选副县长的时候，代表又有看法。”

贺英说：“有看法又怎么样？召开各乡镇书记会、代表团长会，以党性保证，做好工作，必须与县委保持一致。结果不是党代表不照样选上了县委委员，以党性保证，选上了副县长。领导看上的人，没有不行